

北國周末

迪赛制药
荣誉设立
(200 万元)
迪赛
(河山胸腺肽)
细胞免疫
防病治病

较大的收入差距在这一发展阶段依然难以避免,但如何遏制收入差距过快拉大的势头以避免引发社会动荡,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以 2003 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为标志,中国开始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起点,既可能成为加快发展的“黄金发展时期”,也可能因为对各种矛盾处理不当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已经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基尼系数亮起“红灯”

与城市内部的贫富差异相比,城乡之间的差距、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2003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472 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 2622 元。2003 年,一家媒体公布了中国的“400 大富豪”,其所拥有的财富总量为 3031 亿元,相当于 2001 年贵州省 GDP 的 3 倍。

2003 年财政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 年为 0.282, 1998 年为 0.456, 1999 年为 0.457, 2000 年为 0.458, 10 年上升了 1.62 倍。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居民之间收入差异程度的重要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居民收入中不平均分配的部分占全部居民收入的比重。基尼系数最小等于 0,表示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 1,表示居民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基尼系数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 表示比较平均;0.3~0.4 表示相对合理;在 0.4~0.5 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 以上表示收入

数大城市存在,这还不能把外来人口计算在内。

八是下层和中低收入阶层和整个社会严重脱节,形成经济底层社会,并形成底层文化和社会观念。

九是非正规就业是中下层就业的主要形式,在 7.1 亿~7.2 亿的劳动人口中,只有大约近 2 亿人进入正规就业体系,但现行政策却往往打击非正规就业的。

“仇富”心结

如果说由单纯市场作用导致的贫富差距还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并可以通过再分配进行调节,那么另一些“致富”手段就有所不同了。

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发了一通有关贫富分化的牢骚:“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话没错,可你看有些富起来的是什么人?有权有势的,或是巴结权力、贿赂权力富起来的!”但如果是凭真本事富起来的呢?他的回答十分干脆,“那咱没得说!”

类似的观点,有人曾用一句“不是仇富,是仇蠢”表达过。在专家们眼中,在各种导致贫富差距的因素中,尤以腐败和非法致富最“令人憎恨”,也最容易引发社会危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培林指出,市场经济所伴随的贫富差距,与权力经济、非法经济和犯罪经济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性质和效果完全不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它所带来的资源的充分利用、效率收益和剩余的增量,使国家有足够的能在再分配的过程中进行贫富差距的调节,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成本。但权力经济、非法经济和犯罪经济则没有任何公平的前提可言,它们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水火不容。

而一部分人的腐败和非法致富,又使得

经济上去了,但是社会结构没有变化,社会政策没有变化,而且长期依赖美国,以致人家一放手就垮了。”

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曾经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由于城乡差别急剧扩大,规模最大的农民阶层利益受到损害,普遍处于贫困状态,而少数权势阶层则大发横财,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乃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动。

“中国千万不要走这条路。经济与社会一定要协调发展。”陆学艺说,“2003 年最大的成就是,党中央提出和实现了发展观的转变。”

市场讲效率 公平靠政府

从平均主义盛行到贫富差距悬殊,如此剧烈变化发生在短短二十几年之间。有人疑惑,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律使然,还是改革开放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作用的必然结果?

对此,陆学艺的回答是,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肯定是对的。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前,大家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没有激励机制,人民群众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突破了平均主义。

但现在的的问题是,“经济孤军独进,社会、政治改革却相对滞后了;经济范畴的市场经济改造已经取得了成效,而原来

腐败猖獗,使得廉政之事尤为紧要,人们想廉政,盼廉政,却未见其果。于是有人以为,高薪可以养廉,上个月的全“两会”上,北京的代表提出高薪养廉,而这次,深圳则将实行重奖养廉,规定任期内“不出问题”的公务员,退休后可拿一百至二百万元的“廉政公积金”。

以钱开路,决非高招。今出此招,莫非是病笃乱投医?对于廉政,律之不力,而赖之以倡,倡之不彰,而赖之以利,难道真的“钱无耳,可使鬼”?此不可解者六也。

说到钱,这个数目十分巨大的“公积金”从何而来,什

造成社会的畸形和病态,试问个中人,当作何医治?此不可解者四也。

有道是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狡吏贪官为捞钱之秉性难变,非打击不足以惩其恶。然而其知若若打打,貌似廉洁,就能轻易获得“廉政公积金”百万,此不可解者五也。

所以廉政之事,万不可心血来潮。记得几年前,为使行人不乱穿马路,沈阳就出台了汽车撞死人白撞的条款,此条款一出,全国哗然。此次深圳出此规定,此规定一出,又让全国愕然。哗然者,是因其轻率、愕然者,则因其轻率、轻率者,皆是立法之大忌。深圳欲行此规定,吾期以法为不可。以法行则廉,以廉则廉,以廉则廉,今忽之以法,而拜之以利,舍本而求末,万不可行。

有此八不解,便难知深圳此招的高明之所在。更何况

所谓的廉与不廉,是如何个界定法。倘说不抓住其脏者则为廉,“不出问题”则为廉,则太难让人信服。如今腐败猖狂到可怕的程度,而贪官,我们究竟能抓住多少?最近的消息是,某省媒体报道,该省的贪污大案,“八成是群众举报”,并称群众举报成为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获得案件线索的主要渠道。该省如是,其它省市恐亦然。这使教小百姓真的想不通,破这些经济大案,设了那么多机构,养了那么多专门人材,为何就只能抓个“两成”的小头,而大头则由群众为之?须知群众无权,能知贪官多少底细,能报多少?专门部门介入的,方才是“案”,未介入的,不知

晓的,自然与“案”无涉。而谁能见了贪污的庐山面目?因之浮出水面的大案,恐怕也是冰山之一角,底下呢?

起来,收入就不可能同步增长。收入差别的扩大不可避免。

怎么办?厉以宁认为,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出一条平衡的道路。不能采取“均贫富”、“抑富济贫”之类的手段,而是不能让收入差距过分地悬殊,要想办法尽快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如果采取‘均贫富’的做法,顾了这头忘了那头,中国经济起不来!”

论 语

“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收入分配的两难境地。”针对时下大家关注的贫富差距问题,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发表了对于当前中国发展形势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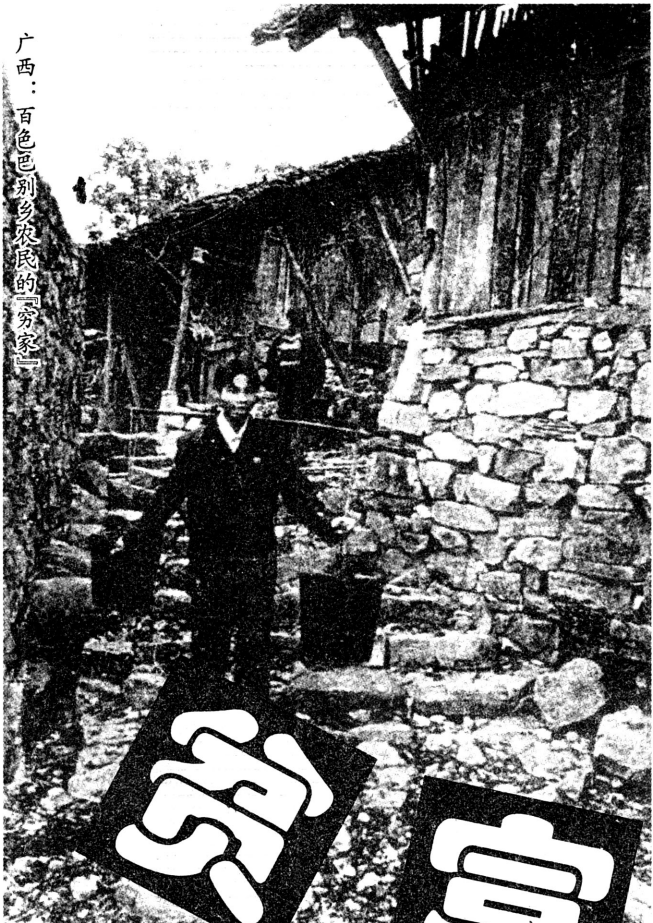
“这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

不能『均贫富』

厉以宁:文/袁祖君

起来,收入就不可能同步增长。收入差别的扩大不可避免。

怎么办?厉以宁认为,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出一条平衡的道路。不能采取“均贫富”、“抑富济贫”之类的手段,而是不能让收入差距过分地悬殊,要想办法尽快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如果采取‘均贫富’的做法,顾了这头忘了那头,中国经济起不来!”



广西:百色市郊区的穷家

广东:广州市的名胜住宅楼

差距悬殊。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指出,无论确切的基尼系数是多少,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中国跑一跑,就一定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差异巨大的国家,当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已俨然国际化大都市的时候,在甘肃、贵州、云南等地的一些农村,其贫穷的状况“令人难以想象”。

贫富分化新特点

李强教授根据他所做的研究,提出了近年来贫富分化的新特点:

一是从总体上看,分化程度上升,但上升的速度比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减缓些。最富有的 20% 人口占收入的 53%~56%,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为 48% 左右;最穷的 20% 人口只占总收入的 2%~4%, 90 年代初期为 5%~7%。

二是财产的集中程度高。最富有的 10% 的人口占有 38%~40% 的财富,若缩小人口比例,财富占有的比例进一步提高,最富有的 5% 的人口占有财富的 25%~30%。

三是区域间分化严重。2002 年,按 2000 年的价格标准,西部 12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东部 3 省(广东、江苏、浙江)低 3675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低 2511 元。

四是城乡分化达到历史最高期。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 3.7~3.9 倍。

五是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分化严重,尤其是农村内部的分化是彻底的,调控手段和调控能力严重缺乏。

六是总的社会结构看,中国的金字塔社会没有改观,农村的贫穷解决不了,金字塔社会就存在。

七是中国社会是一个中间阶层严重欠缺的社会,农村和中小城市都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没有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只在少

挑战中国发展

□文/戴廉

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在大众心理上更加放大,并产生“示范效应”和法不责众的心理。

在导致贫富分化的几个因素当中,腐败是导致群众不满、激发矛盾的最主要因素。他认为,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关注老百姓的承受力

李强说,虽然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国际上还不算是过高的,非洲、南美洲的某些国家基尼系数高达 0.5 以上,有的甚至超过 0.6,但要注意到,不同的民族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不一样。像上述那些高基尼系数国家,由于历史传统、文化模式等原因,居民可以承受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压力。然而就中国的状况而言,老百姓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目前还难以判断。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历史上中华文化中的“均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一直很强,因此,目前的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很大的压力了。另一方面,与改革前相比,老百姓承受压力的能力也确实大大增强,对于贫富差距显示出了相当高的容忍度。

李强认为,今后十几年,如果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那将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说,“中国现在最怕的就是拉美化,那时,拉美的 GDP 上去了,

该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效率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公平则需要靠政府来创造。”陆学艺认为,在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上,国家应该起到应有的作用,要干预政策,干预社会,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已经上去了,但公平问题却迟迟得不到重视。“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解决公平问题的时候了。”

李培林认为,解决公平问题必须从调整收入分配和制度入手。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初始分配主要应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来决定,国家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影响和调控再分配。如果国家过多地干预市场领域的初始分配,必然会影响效率,而如果对再分配领域放任不管,则必然会导致贫富悬殊。

李培林以英国为例,说明了税收和福利政策对家庭收入的再分配所起的重要调节作用。1994/1995 年,英国全部家庭的年收入按五等分划分,最上层 20% 家庭的平均初始收入与最下层 20% 家庭相比,两者的收入差距是 19.8 倍。但是,加上家庭的货币福利收入,减去收入税、国家保险税和地方税,再减去间接税,最后再加上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各种实物津贴和补助以后,两者的最终收入差距仅为 3.7 倍。在这里,税收和福利政策的作用可见一斑。

一般来说,人们调节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是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以及基于税收的转移支付能力,这是决定一个社会对某一特定的初始贫富差距承受力的主要方面。李培林说,“初始的收入差距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收入差距丧失了调节的能力。”

第八届西洽会成果丰硕

共签订国内横向联合项目合同一千多个 总投资额一千余亿元

本报讯 经过 4 天热烈而紧张的洽谈交流,第八届西洽会昨天在西安落下了帷幕。

据了解,本届西洽会的国内横向联合项目成交额大幅增长,共签订国内横向联合项目合同 1039 个,总投资额 1062.7 亿元,比上届增长 80.1%;国内横向联合项目协议 408 个,总投资额 1295.34 亿元,比上届增长 104.2%,而且重大项目多,投资规模大,10 亿元以上的项目合同 17 个,总投资额 472.6 亿元,占国内横向联合项目合同总投资额的 44.5%。投资方向更加符合结构调整和相关产业发展需求,国家鼓励发展重点领域项目成果突出。其中我省共签订了国内联合

项目合同 606 个,项目协议 159 个,投资额分别为 506 亿元和 595 亿元。在本次大会上,共签订利用外资项目合同 102 个,总投资额 13.38 亿美元,其中外资额 9.33 亿美元,我省签订利用外资项目合同 73 个,项目协议 35 个,投资额分别为 5.9 亿和 5.5 亿美元。

本届西洽会上,产权交易项目取得了新的进展,签订产权交易项目 76 个,总投资额 384.2 亿元,占国内横向联合项目协议总投资额的 16.3%。非国有企业所占比例达 60% 以上,总投资额 947.73 亿元,占 40.2%。

据悉,第九届西洽会明年 4 月上旬仍在西安举办,吉林省政府为第九届西洽会的大会执行主席单位。本报记者 朱碧波

在网络世界实现“奥运梦” 首届全国电子竞技运动会下周揭幕

“ 本报讯 首届 2004 全国电子竞技运动会将于 4 月 17 日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武汉、长沙、沈阳、成都等 8 个赛区全面展开。全国各地的电子竞技爱好者可以自由选择赛区报名参加比赛。比赛将选拔出优秀选手组成国家队,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性的电子竞技赛事。”

2003 年 11 月 18 日,中国电子竞技运动被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列为第 99 个体育运动项目,简称 CEC。CEC 是以电脑

软硬件及网络设备为器械和场地,在统一的竞赛规则下进行的对抗性益智游戏运动。

比赛项目分为对战类和休闲类两类。对战类项目包括:反恐精英、FIFA 足球 2004、魔兽争霸 3、冰封王座和星际争霸母巢之战;休闲类项目包括:围棋、中国象棋、桥牌、四国军棋、升级、拱猪和二打一(斗地主)。目前西安赛区已有 400 多名电子竞技高手报名,报名时间将延续到明日。

本报记者 郭玉军



宁陕县第八届“西洽会”集中签约

声势浩大的第八届西洽会落幕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回顾西洽会,给人的感慨颇多,会场上有冷有热,会场外亦有说不尽的话题。

政府热心 企业平淡

单看西洽会的主办单位,便知政府对此次大会的重视。再看各省市浩浩荡荡的政府团队,便知各级政府对于大会寄予的厚望。招商引资、产权交易等等,凡是政府能想到的,一古脑儿都上。各类签约仪式上,政府领导排列整齐,项目推介会上也少不了领导的身影。政府对西洽会的关心不外乎出于“名利”的考虑。据了解,每个省市负责招商引资工作的领导都需要政绩来支撑,政绩不外乎为本省市引来多少多少资金。另外,引资后的奖励也颇诱人,有的省是投资额的 1%~3%,个别省更高,一旦政府出面参与洽谈成功,可名利双收。

与政府热心参会相比,企业参会心态相对平和,特别是国企,对此次西洽会上并不很热心。民企和非公有制企业是会上主体不假,但也不是全身心投入会场。延炼集团的摊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来他们不想参会,是上级指定的。

据了解,省直企业公司的参展企业有一部分是反动员才来的。在西洽会主会场的二楼展区,从 4 月 5 日开展,河北、天津、辽宁等省市的部分摊位就是空的,原定的参展企业未来布展。部分参会参展民企干脆包了宾馆自主“办公”。

政府热心 企业冷淡

据西洽会组委会介绍,民企并不见得总记着政府的热心。贵州一家民营药厂的李总说,政府让他们把早已谈好的合同拿到西安来签,走个形式。他明白,一次能办好的事为何要费时费力。据了解,西洽会上有的项目是企业早已谈好,应政府之约来西安签署。一热一冷,反映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属于服务型的各级政府对西洽会的看法。政府本来就是为企业服务的,给政策、给环境是其职能,强令摊派、越俎代庖不是其本质。

企业的李总说,政府让他们把早已谈好的合同拿到西安来签,走个形式。他明白,一次能办好的事为何要费时费力。据了解,西洽会上有的项目是企业早已谈好,应政府之约来西安签署。一热一冷,反映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属于服务型的各级政府对西洽会的看法。政府本来就是为企业服务的,给政策、给环境是其职能,强令摊派、越俎代庖不是其本质。

中介机构热 买卖双方冷

今年的西洽会的一个热点是产权交易,参会各省市都有一批产权交易项目粉墨登场。成立不久的西部产权交易所联合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更对会上的产权交易项目寄予厚望。据西部产权交易所的负责人王浩生介绍,交易所已储备了一批项目,在会上想再促成几个项目交易。会间,王浩生四处奔走,急欲促成交易。像“西交所”一样欲促成交易的中介机构不在少数,信托投资公司一类的中介机构也在会上亮相,可似乎买卖双方对中介机构并不感兴趣。渭南市将澄城卷烟厂“卖”给徐州卷烟厂,也是去年买卖双方经过接触定下终身的,徐州卷烟厂投入 7 个亿整体兼并澄城。还有一些产权交易项目,双方绕过中介机构“冷”处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中介机构在西部是一种新生事物,企业对其还不了解;其次,买卖双方更愿意私下交谈,多了个“媒人”反倒不自在。

本报记者 赵阳

西洽会专递